



# 王琦美术文集

艺海风云（上）

5

中国文联出版社

荣誉出品人：王光英  
出 品 人：邓培星  
总 策 划：张金卫  
出 品 单 位：纪念王琦从艺70周年筹备小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琦美术文集·艺海风云·上 / 王琦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10

ISBN 978 - 7 - 5059 - 5690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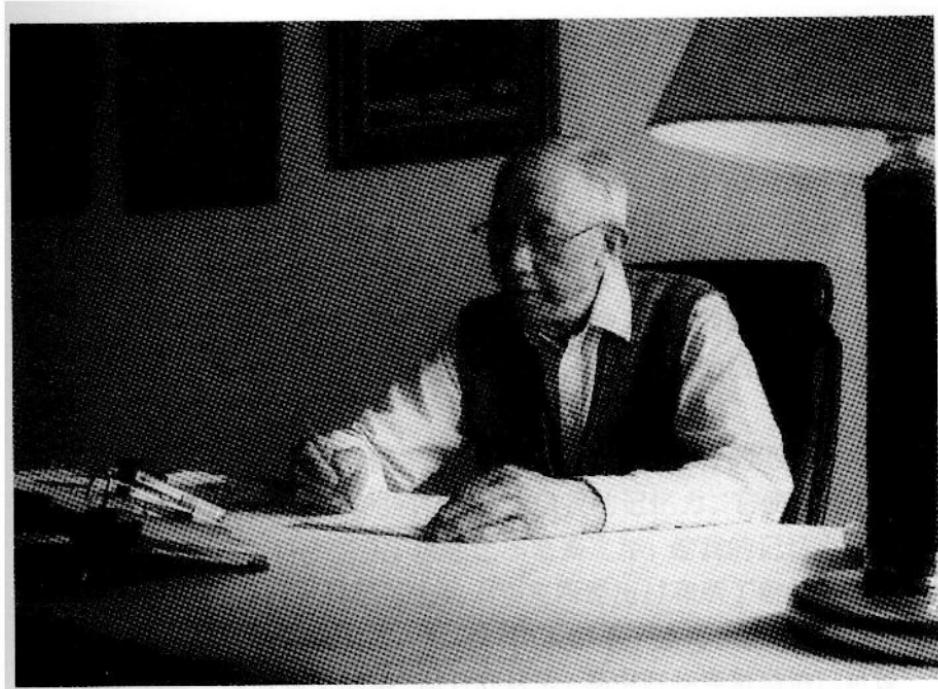
I . 王 … II . 王 … III . 艺术评论 - 文集 IV . J0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563 号

书 名	王琦美术文集
编 者	王 琦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 - 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责任校对	王建党
责任印制	李寒江 王其芳
印 刷	中青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0.375
插 页	58 页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5690 - 2
总 定 价	40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前　　言

这是一本自传体的回忆录，从少年时代一直到1978年，前后共60年，按年代次序写成。虽然每一部分都有一个中心内容，但前后仍有紧密的联系，有些活动情况还是互相交叉。特别是在抗战时期重庆的部分，当时我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同时又在育才学校任教，并兼顾中国木刻研究会的会务，这三方面的活动几乎都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

在撰写这部书的时候，一部分是根据我手头保存的笔记和实物资料，大部分仍是靠我的回忆，我自信我的记忆力，它使我在“文革”时期少吃了许多苦头。现在已届耄耋之年，趁我的记忆力尚未衰退的时候，及时把自己过去数十年来所经历过和所了解的一些历史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为后一代人留下一点可供参考的资料，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我认为，其中有些资料恐怕已可说是“孤本”了。

回忆录是以事实为主，我个人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或参与者，尽可能把事实真相详尽无遗地写出来，时间、地点、人名都力图做到准确无误。在涉及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情况时，为了保留历史的原貌，只写事而不得不省略了一些当事人的姓名，希望这些同志们有所理解。例如在“文革”初期大家在集训班里那部分，许多同志都在大会上作了违心的“自我检查”，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并在自己头上扣上许多不应扣的大帽子。可见当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已达到何等荒唐可笑的程度！我在回忆录中如实地记下这些事

---

实，也是意在昭示来者，今后绝不让这段历史重演。

回忆录写到了1978年便告一段落。这之后又过去了20年，在这20年中我们参加过的活动，曾在书中卷尾列举了一些重要项目，今后将陆续把它写出来，作为这本回忆录的续篇。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曾得到一些友人的宝贵提示和意见，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更希望在本书出版以后，如果有当事人或知情者对书中有与事实不符的内容，能直率地提出加以纠正，更当感激不尽！



1997.11.15

## 目 录

前言	1
金色的童年	1
大学时代	8
抗战美术的洪流	
——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	13
难忘的延安岁月	
——在“鲁艺”美术系	23
吹响“战斗美术”的号角	29
“皖南事变”前后	41
风起云涌的木刻运动	
——重庆“中国木刻研究会”的始末	54
在重庆天官府七号院内	
——文化工作委员会片断	74
育才学校三年间	87
在民主运动高潮中	95
抗战八年木刻展及其它	105
香港两载	122
重返育才	
——在上海行知艺术学校	147
初进京城	156
胡风事件前后	172
迎来文艺的春天	186
1957年反右风暴	200

---

在大跃进年代	216
第三届文代会前后	226
教材与画室	230
美院“社教”与农村“四清”	238
在集训班的日子	249
牛棚生涯	271
军垦农场三年	289
批“黑画”	298
文艺园地的回春	304
还人们以本来面目	310
人生的新里程 ——光荣入党	322

---

## 金色的童年

在我一岁多的时候，我家住在重庆江北县盐局的宿舍，当时我的父亲是盐局局长。我常常见他晚上一人坐在椅子上弹七弦琴，这使我从小受到音乐的熏陶。父亲还写得一手好字，我见他常常铺开洁白的纸，写出一张又一张工整的楷书。他常常为亲友写扇面，母亲则在扇子的另一面画上一些花卉和鸟虫，我对这些图画也非常感兴趣，这也许是我接触美术的开始。从此，音乐和美术的因素便在我的精神细胞里渐渐滋长并不断地扩大和发展。

在我3岁的时候，我家从盐局搬到另一个住处，这里叫桂家洋房子，是两层楼房，居住条件比盐局要好。楼上中间的堂屋里是父亲会客和用餐的地方。正中墙壁上挂有一幅清代画家的图画，题名《东坡骑驴过断桥》。我拿着铅笔在画下端空白处依照着画面画了一个老人骑在驴背上的情况，图样很小。父亲见了后勃然发怒，问家人是谁乱画，损害了他心爱的古画。我的大哥13岁，三哥8岁，四姐5岁，在父亲的斥问下都默不作声。三哥却指着我说：“恐怕是五弟画的哟！”父亲和母亲都否定他的说法，父亲说：“五弟这么小，哪能画得出来？”我在一旁暗地里好笑，心想这就是我画的，但我怕挨打，也没有勇气出来承认错误。后来父亲很和气地跑到我跟前对我说：“是不是你画的，说实话，爸爸不会打你！”我才点了点头。家人都哗然，父亲的脸色从原来的怒气冲天转为喜形于色了。他要大哥用橡皮擦去画上的铅笔痕迹，并且专门为我准备了一

---

块小黑板和几支白粉笔，供我画画。从此，我不仅在黑板上画了又擦，擦去又画，还拿着粉在地上到处画，画马、画鸡、画狗和猫。没有临摹范本，家里养有鸡、犬、猫，出门常见到马和牛，便凭自己的印象来画。

5岁时，我们家又搬到江北县的一所大院，名叫邓家院。这里住了好几户人家，都是父亲的朋友。这所大院前面有宽敞的院坝，院坝的边缘是月台，我们站在月台的石凳上，便可望见扬子江对面的南岸弹子石。扬子江停泊了两艘小型的法国军舰和日本军舰。扬子江中常常有鸣着汽笛的轮船往来。父亲有时坐船去上海办事，回来时，我们便在月台上远远地望着父亲在轮船上用手巾摇晃，和家人打招呼。月台下面便是平民住宅，我们有时不慎从上面掉下一些石块，打碎了别人住宅的瓦片，便引起了下面一片叫骂声，有时还跑上来向家人告状，我们却一溜烟地跑开了。

四川军阀不停地战争，闹得老百姓鸡犬不宁，邓家院的大厅和走廊，常常成了过路军队的驻地，一来就是住上十天半月，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这些散兵游勇赌博、酗酒、打架……，有时被长官体罚、打板子，痛得叫苦连天，弄得全院的住户坐立不安。后来父亲与同院的两位友人（一位是处长，一位是科长），在重庆盐运使的主管人陈国栋将军处弄了一张“告示”贴在大院的大门上，不准军人进驻，才结束了这样混乱的局面。

父亲是一位实业家和教育家，当时他当过宜昌川江轮船公司的经理，又是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的董事、重庆书店的股东、上海良友公司创办时，他也是股东，又是重庆宏育中学和江北治平中学的校董。在邓家院时，他自己在家里办了一所私塾，名叫“恒德学校”。学生除了我家的兄弟姐妹以外，便是亲友的子弟，共有十几个同学，请了两个教师，一个教文、史、地，一个教英文和数学。

我6岁那年入学，当时我的大哥已离开家庭私塾，由父亲亲自送他到北京去念书，三哥和四姐仍然留在私塾里，父亲非常崇拜教

---

育家陶行知（当时还叫陶知行），当他在画报上看见介绍南京晓庄师范的教学情况时，便欣喜若狂地拿来向老师推荐，要他们效法晓庄师范的办法，学生除了课堂教学以外，还要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当时我家有一个很大的后花园，我们便在那里种蔬菜和玉米，栽果树和花木，久而久之，劳动便成了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自觉地干各种各样的家务劳动，打扫清洁卫生，不但不觉得是负担，并从其中发现一种格外的乐趣。父亲每天晚上都要查看我的日记，当他看到我在日记中写有“一天不做事真是无聊”一句话时，便大为嘉奖地用红笔在旁边划上密圈。

我入学那年也正是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革命高潮使整个山城变得热气腾腾，街上随时有游行队伍走过，“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不停地在耳边回荡。我们的国文老师陈小寅和英文老师喻麟祥都是共产党员。陈老师常常在课堂上给大家讲革命的道理。我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李大钊的名字，也开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仇恨的种子，初步激发了我的正义感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使我逐渐懂得了人世间的爱和恨。

我们的国文课有文言文和白话文。白话文是选读新文艺作品的短篇小说和小品文，如冰心的《寄小读者》，郁达夫的《日记九种》，王世颖的《倥偬》，鲁迅的《呐喊》、《彷徨》等。特别令我不能忘记的是还有两项十分有意义的课外活动，一种是每星期六早上的演讲会和辩论会，每个同学都要上台发表十分钟到半小时的演说，谈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也可以谈自己对人生、社会和时局的看法。陈老师说要通过这样的活动来训练我们的口才，将来好做宣传工作，同时又是同学们的知识竞赛。它迫使我不得不养成多读书、勤看报的习惯。当时，也许是智力开发较早的原因，《少年》月刊和《中学生》杂志已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我经常阅读的是《语丝》、《北新》、《莽原》、《幻洲》、《拓荒者》这类新文艺杂志，还加上良

---

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好几种画报和刊物。我每次演讲或辩论的素材都是从这些出版物取得的。因此，我有时滔滔不绝地演说，也常常得到陈老师的嘉许和同学们的钦慕。另一项课外活动是办壁报，壁报的名称叫《灯塔》。老师分配我当编辑，每期用十分整齐端正的仿宋体钢笔字写在一整张铅笔画纸上，约有六七千字的文字稿，还要配上一些插图和装饰刊头。这可以看作是我后来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的最早的预习。这两项课外活动都是在陈老师指导下进行的。

父亲的文化修养较高，兴趣很广，他结交了不少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其中也有音乐家和画家。他买了一架钢琴和许多铜管乐器以及中国乐器，请了重庆西南美专一位钢琴老师郭少猷来教我弹钢琴。每星期六下午，还在家里举办音乐沙龙，邀请十几位搞音乐的老师和同学来家里聚会，吹、打、弹、奏，搞得十分热闹。我就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受到了熏陶，培养了我对音乐的莫大兴趣和欣赏能力。

不久，四川军阀在重庆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那天我正跟着父亲在亲戚家做客，突然听见外面街上闹哄哄地乱作一团。人们在嚷：“打枪坝打死人哪！”那天正是重庆各界举行大游行，在通远门外打枪坝集合。我的大哥和三哥也在游行队伍里。父亲一听说打枪坝出了事，便急急忙忙带着我穿过街上混乱的人群，赶到打枪坝去。那里门外有卫兵守着不让人进入，父亲给他看了自己的证件，才让进去了。场上堆着一百多具尸体，惨不忍睹。父亲把每具尸体仔细地查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大哥和三哥，才放心了。回到家时，两位哥哥都已回来了。大哥的眼镜被打坏了，手表也被刽子手抢走了。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整个山城陷于白色恐怖中。街上常常发生抓人打人的事情，学校停课了，江北中学的学生有的和我大哥是同学，常常三三两两地跑到我家来躲避。陈老师和喻老师都不见了。过了一个多月，陈老师才悄悄跑回来。前一段时期他躲在乡

---

下一个朋友家里。喻老师据说已去上海了。私塾里一位最年长的同学江英，他的父亲是开茶馆的，他早就是陈老师重点发展的对象，“三·三一惨案”前后，他十分活跃，后来也不见人了。两年后，我们在报上看到一则报道红军在川鄂边境活动的消息，才知道他已当上红军的旅长了。

陈老师回来后，由于革命低潮对他的消极影响，他不及以前那样活跃了，但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地教育我们，他推崇孙中山和宋庆龄，骂蒋介石和汪精卫，也常常对我们上时事课，告诉我们中国的大军阀和他们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是谁。如果说，陈老师在这两三年对我的教诲，使我从理智上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那么，“三·三一惨案”血的事实，却是在感情上使我懂得了爱和恨。而使我明白，要干革命，要解放大多数人，单凭个人的热情是不行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更多的人才能济事。我想，我将来如果要当一名能够唤起民众的宣传员，就必须掌握好宣传的武器——丰富的知识与技术。

我对知识的渴求，不仅是为了将来参加革命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能在那个社会求得生存的权利。总之，非使自己刻苦努力不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成了我当时的座右铭。历史上那些苦学成才的事例（如苏秦刺股、匡衡凿壁）成为我勤学苦读的榜样。我想我的条件不知比他们要好多少倍，我家里书籍堆积如山，古今中外，一应俱全，就看你肯不肯去利用它。我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贪玩，而乐于在书桌上埋头用功。在春节大年初一，当我们大院的许多孩子都在闹着放鞭炮或火花的时刻，我却一个人伏在案头读书或抄写笔记。可我也不是书呆子，我喜欢各项运动，篮球、足球、乒乓球都是我的爱好。除了读书、写字、作画以外，很多课余时间是花在球场上和琴旁，我这样的嗜好和生活秩序一直保持到大学时代。

父亲和老师对我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使我在小学时代便念完

---

了《古文笔法百篇》、《古文观止》、《左传》、《读史论略》、《唐诗三百首》其中我最喜欢的文章是王勃的《滕王阁序》、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李密的《陈情表》、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等，这些古代经典之作，我至今还能背诵出来。此外，还同时看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西厢记》、《老残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绍钧、巴金、蒋光慈、郁达夫等作家的一部分著作。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灭亡》和《家》、蒋光慈的《菊芬》和《鸭绿江上》。在初中一二年级时，我便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古文辞类纂》和一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果戈理的《外套》、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大仲马的《侠隐记》、辛克莱的《石炭王》和《煤油》、绥拉菲维莫支的《铁流》、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等。这几年我简直成了一个书迷，家里每周给我的三元零用钱，全部花在买书上。重庆书店的经理杨世才知道我是书店股东之子，每次买书都是七折优待。我对书是爱之如命，每本新书都和牛皮纸包起来，在看完以后仍然要保持新书的原貌，如果有人借了我的书在归还时发现有小的污损，我就把这本书奉送给他，自己另外去买一本新的。我的书架整齐得像排队练操的军队一样。我从小便有爱整洁的习惯，我不能容忍我的书桌、书架、床铺和周围环境呈现零乱的状态。我讨厌那些不修边幅在生活上散漫无章的人，我认为这是和一个人的素养和精神面貌分不开的。我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1970年下放劳动的时期，我在炕头的内务也是经常受到表扬。

父亲看到我爱书的习惯，当然从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他写信给在上海念书的大哥和三哥，要他们把“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书都买来，我在家里经常收到一大包一大捆从上海寄来的

---

书。后来父亲又向商务印书馆预约了《万有文库》，这部卷帙浩繁的文库到1931年父亲去世时尚未出齐。我当时置身在书海里，有目不暇接之感，只好选我最感兴趣的书去翻阅，除了那本吸引我读了两遍的《太平天国革命史》以外，斯蒂文生的《金银岛》和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也使我爱不释手。还有那不属于《万有文库》的曾经当作国文教材来选读的一套《少年丛书》，其中全是古今中外的名人评传，像家喻户晓的宋代民族英雄岳飞，争取美洲独立的华盛顿，解放黑奴的林肯，以弱抗强、打败了拿破仑的英国名将纳尔逊和惠灵顿，虽然都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但我从来也不曾打算将来也要做他们那样的英雄人物，我的唯一志向却是当一名作家或艺术家。

我14岁时，父亲去世，他经办了许多年的私塾恒德学校也解散了，我转入治平中学上初中二年级，在各门功课中，我成绩最好的仍然是作文和图画、音乐。教我们图画课的仍然是在私塾教课的袁亭楷老师，他本来是治平中学的学生，由于图画、音乐课成绩特别优异，父亲便请他来恒德校当我们的美术、音乐老师。他又是我家文艺沙龙的积极分子，后来进入西南美专，毕业后便在中学校担任美术教师，我在和袁老师接触的过程中，认为他在艺术上有很高的天赋，可惜他的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较差，所以未能去上海继续深造。可是他对我在艺术的启蒙教育上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多年来，我一直以十分尊敬和感激的心情，怀念着曾经在我的少年时代，从思想上、艺术上有很大影响的陈小寅老师和袁亭楷老师。

---

## 大学时代

1934年7月，我只身离开重庆乘船上海，住在石煤姊家。原来是打算考国立音专，后来看见音专的招生广告，知道自己的条件不够，便打消了当音乐家的想法，改考上海美专。美专的校长刘海粟是著名的画家，他和徐悲鸿、林风眠、张聿光、颜文樑、汪亚尘等画家的名字和作品，我都早已在画报或杂志上见到过，正是他们的出色艺术成就才把我吸引到美术的道路上来。我在考试那天，第一次跨进美专的大门，便使我领略到艺术之宫的不同寻常的文化气氛。陈列室里的十几幅欧洲绘画名作，虽然是临摹品，却也深深地抓住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反复欣赏不舍离去，特别是米勒的《拾穗》和德拉克洛瓦的《但丁的小舟》，使我感到绘画艺术竟能有如此巨大的表现力与魅惑力。

一年级是画石膏像，教师是倪胎德。我在中学时便读过他的小说《玄武湖之秋》。他是画家兼作家，因此早已在我心目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在同班同学中，丁正献是和我最要好的一位，他和我同住一间寝室。1936年暑期，我不幸患了伤寒症，在病中得到他的尽力照拂，深厚的友情使我永记不忘。

从二年级开始，自选画室学习。当时有三个画室，由王远勃、张弦、刘抗分别任主任教师，我选进张弦画室。张弦老师的油画风格接近欧洲现代派，但他极为重视素描基础的训练，在课堂上要求同学十分严格，特别要大家重视人物形体结构和解剖部位的分析、把

---

握、张弦本人的素描成就是很高。当时金城工艺社出版了他的素描活页选，我们都买来当作学习的最好范本。张弦画室过去的老同学如王益论、吴甲丰、王式廓、郭牧、张学武等，他们的毕业留校作品陈列在走廊的两旁壁上，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不幸的是张弦老师于1936年暑期回到家乡浙江青田时，因游泳不慎而遭没顶之灾。噩耗传来，全校师生无不同声惋惜。学校为他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蔡元培部长也亲自出席表示悼念。后来又在大新公司画廊为他举办了一次遗作展览，我花了15元购藏了他于1929年在巴黎创作的一帧人体素描。直到今天这帧珍贵的作品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我在学校时，除了按时上教室作画以外，余下的时间大部分是泡在图书馆里，埋头看画册和有关美术史和画家评介的书籍。当时在一班同学中，画画的风气是顶浓厚的，而读书的风气却很淡薄。所以我们的刘校长到图书馆去查看时，发现我借书的次数很多，便对教务长谢海燕老师说：“王琦这个同学如此用功读书，很难得，我很想见见他。”其实，当时我对艺术书籍之所以大感兴趣，完全是出于我的强烈的求知欲，不仅是艺术知识，即使是一般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识，也是我的渴求。当时给我们上艺术理论课的是向培良先生，他给我们讲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同时也向我们推荐托尔斯泰、卢那卡尔斯基、蒲列汉诺夫的三本《艺术论》。我自己又阅读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我认为当时使最感兴趣而又获益最多的还是厨川白村的这三本著作。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大学生不进舞厅的是凤毛麟角的。在美专，每天晚饭后，校门口总是停着不少出租汽车，载着男女同学们去“大都会”或“百乐门”舞厅。而我却除了呆在寝室里看书以外，便是在乒乓球室里打乒乓球。我是美专乒乓球和篮球的校队成员，经常和其他大学的校队进行友谊赛。运动之外，我是音乐和电影的